

论《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资本的双面性^{*}

钱智勇

【内容提要】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科学阐释了资本具有双面性，即其文明性和野蛮性并存。资本的文明性与野蛮性表现在资本的生产目的、生产方法、生产关系等三个方面。资本的生产目的、生产方法、生产关系的文明性主要表现为促进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资本的生产目的、生产方法、生产关系的野蛮性主要表现为剥削劳动、异化劳动、分化财富。马克思认为，资本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是历史的、暂时的，因此，资本的文明性和野蛮性也是历史的、暂时的。

【关键词】《资本论》 资本的文明性 资本的野蛮性

作者简介：钱智勇（1972-），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长春130000）。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科学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是一个双面性存在，其文明性和野蛮性并存。马克思认为：“只有资本……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①具体地说，“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②。马克思在肯定资本的文明性的同时，又深刻揭示了资本的野蛮性——劳动被剥削、被异化以及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资本的文明性和野蛮性集中表现在资本的生产方式上。生产方式本身是生产财富方法，一定的生产方法以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马克思阐述了生产方法的几种形式——独立劳动生产、协作分工生产、机器生产。马克思认为，资本的生产方法的主要特征在于，利用协作分工生产、机器生产以达到所要实现的生产目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③。马克思认为，资本的生产方法在生产财富的实践中，形成特殊的生产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劳动使用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的关系，而是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使用劳动的关系。据此，本文立足《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关于资本的相关研究，以资本的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从资本的生产目的、生产方法、生产关系三个方面，科学厘清资本的双面性——文明性和野蛮性。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研究”（21AKS006）的阶段性成果。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7-92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97页。

一、资本生产目的的双面性

1. 资本生产目的的文明性

人类生产财富的目的决定于财富的自身属性。人类社会的发展至今，财富的属性，由单一的使用价值属性向双重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属性转化。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生产财富的目的或者是以财富使用价值为核心，或者是以财富价值为核心。简单地说，在资本的生产方式下，资本的生产目的是生产财富的价值；准确地说，这种价值是增值的价值。由于财富价值脱离了财富使用价值不能单独存在，资本为实现财富价值增值的生产目的，必须被迫生产出财富的使用价值。就资本的生产目的来说，资本的文明性表现为：这种以财富价值为核心的生产目的相对于以往以财富使用价值为核心的生产目的，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生产力水平。

以往以财富使用价值为核心的生产目的，生产的规模以生产者或者生产资料所有者对财富使用价值的生活需要为界限，由于这种生活需要的范围和规模是有限的，甚至是狭小的，因此客观上导致人类的财富生产规模和生产力水平被限制在狭隘的水平上。而资本的生产目的是以财富价值为核心，追求的是财富价值的增值，并且要求这种追求以价值的一般社会形式——货币形式——实现，这种追求欲望就其本身来说是无止境的。可见，资本对财富价值增值的追求永远在路上，没有终点。因为财富价值和财富使用价值的不可分性，资本为实现财富价值增值的生产目的，资本表现为不断地提高财富使用价值的生产力水平，孜孜不倦地去追求其永远也得不到满足的欲望。

资本以价值为核心的生产目的促进了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进步，这种“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①，具体地说，是财富使用价值的生产力。作为资本文明性表现的财富使用价值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既是资本追求以价值为核心的生产目的的手段又是其结果。从抽象的理论推断上来看，财富使用价值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似乎与财富价值增值相矛盾，因为财富使用价值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将降低单位财富使用价值的价值。这种反比关系与资本所期盼的财富价值增值的初衷相悖，这种反比关系会促使资本阻碍财富使用价值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现实的资本实现生产目的的运动与抽象的理论推断之所以不同，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单位财富的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但既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内财富的相对增值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这里的劳动生产力代表的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社会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劳动力价值降低，这样社会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虽然降低了单位财富的绝对价值，但却提高了单位财富相对增值价值的比重，从而最终导致既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内财富相对增值价值总量的增加。

另一方面：资本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总是从个别资本开始的，个别资本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与整体社会劳动生产力水平提高存在时滞。个别资本将充分利用这个时滞，在这个时滞内，个别资本生产的个别财富使用价值的价值低于这种使用价值的社会价值，但却以社会价值实现，从而使个别资本获得超额增值价值。个别资本的超额增值价值成为其他资本效仿其提高劳动生产力的重要诱因，在这种诱因的驱使下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由此可见，单纯地从资本生产目的和社会生产力的关系来看，资本具有文明性。以往以财富使用价值为核心的有限的生产目的，使人“只是为了自己小小的私利、为了自己的织机和小小的园子而活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页。

着”，并且“在自己的平静、刻板的生活感到很舒服，如果没有工业革命，他们是永远不会脱离这种生活方式的”^①。而资本的这种以财富价值为核心的无限的生产目的，打破了这种田园式的宁静。

2. 资本生产目的的野蛮性

与资本生产目的的文明性并存的是资本生产目的的野蛮性。这种野蛮性表现在资本为实现价值增值的生产目的，对劳动不择手段地掠夺和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阻碍。资本之所以能够实现价值增值的生产目的，是因为资本将劳动作为资本增值的手段发挥作用。资本雇佣劳动，支付给劳动者的只是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是劳动，而劳动创造的价值大于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这二者的差额成为资本增值的价值。可见，资本自行增值的奥秘实质上是资本对劳动的野蛮掠夺。资本为实现价值增值的生产目的，对劳动的野蛮掠夺集中体现在对劳动者剩余劳动时间的无偿占有上。在资本的生产方式的不成熟阶段，资本实现价值增值生产目的的野蛮性是赤裸裸的、毫无掩饰的，那就是不断延长工作日，进而不断延长超过劳动者必要劳动时间的剩余劳动时间。在这一阶段，资本价值增值的生产目的的野蛮性具体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吮吸”^②。资本在其发展的初期通过国家政权，利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等方式强制延长工作日长度，牺牲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吃饭时间和睡眠时间为资本增值服务，造成劳动者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

在资本的生产方式的成熟阶段，资本实现价值增值生产目的的野蛮性变得隐蔽了，那就是通过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工作日既定的条件下，相对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在这一阶段，资本价值增值的野蛮性具体表现在，由于不断延长的工作日遇到自然界限和社会界限，资本在既定的时间内只有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才能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进而增加剩余价值，这种目的直接促成了机器的普遍应用和资本生产方式革命。机器的应用降低了生产过程对劳动者“特殊技能”的依赖，取而代之的是“机器的协作”。这种对劳动技能要求的简单化，不仅直接导致了劳动的异化，而且扩大了资本所能使用的劳动范围，“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③！这意味着在资本起步阶段所依靠的成熟劳动力被边缘化和淘汰，处于相对过剩状态。可见，劳动者不但没有从生产力的发展中享受更多的使用价值，反而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丧失了自身的劳动力价值。

资本追求价值增值的生产目的的文明性并非绝对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资本实现价值增值目的的手段和中介，也就是说资本关心的并不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本身，如果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悖于资本价值增值的生产目的，资本会毫不犹豫地延缓和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价值增值的生产目的又表现出野蛮性。资本价值增值的生产目的永远以其个体利益为出发点，而不是以社会利益为出发点，然而，资本的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并不是完美的统一。

一方面，资本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目的是要实现其价值增值，在这里资本所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是有潜在的界限的。具体地说，所生产的财富使用价值的数量和规模必须以能否实现资本价值增值为界限，也就是说，在财富使用价值生产的一定水平上，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即便有利于财富使用价值的数量增加和规模扩大，实现更高水平的社会利益，但如果这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不能进一步实现资本价值增值的生产目的，资本将果断地放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另一方面，资本价值增值的生产目的对社会生产力的限制，还表现在财富使用价值的生产范围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5、453页。

和种类上。资本对财富使用价值的生产是有选择的，资本选择何种财富使用价值进行生产，并不以这种财富使用价值是否满足社会需要为出发点，而是以这种财富使用价值是否能实现财富价值增值为出发点。一种财富使用价值的创造和生产，即便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人类的生活，但对资本而言无利可图，资本也绝不会涉足这种财富使用价值的生产领域，在这里用唯利是图来形容资本再恰当不过。由此可见，剩余价值的生产，“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决定目的、驱动利益和最终结果”^①。“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②

二、资本生产方法的双面性

1. 资本生产方法的文明性

在资本的生产方式下，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进步的文明性同样通过资本的生产方法表现出来。在任何生产方式下，生产方法都体现为财富使用价值的生产方法，但资本的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③，任何财富使用价值生产方法的改良都以价值增值为出发点。资本起初并不关心它所征服的生产方式的财富使用价值生产方法本身，资本“起初，它是遇到什么样的劳动过程就采用什么样的劳动过程”。然而，以往的财富使用价值生产方法只能带来有限的财富价值增值，“因此，他的劳动生产条件，也就是他的生产方式，从而劳动过程本身，必须发生革命”^④。这种财富使用价值生产方法的革命，或者说文明性，表现在资本的协作、分工和机器大工业等生产方法的具体形式上。

在资本的生产方法之前，无论是传统农业还是行会手工业生产财富使用价值的方法，其最大特点是以劳动者的独立劳动为特性。这种财富使用价值的生产方法对于财富价值增值而言，是落后的，不能最大化实现资本财富价值增值的目的。因此，相对于劳动者独立的生产，劳动者协作生产成为财富使用价值生产的必要。“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⑤。资本的协作生产方法将独立的单个劳动过程转化为相互依赖的结合的社会劳动过程，这种生产方法改良的文明性突出表现在财富使用价值生产效率的提高。协作增强了劳动的社会性，将个体劳动的生产力转化为结合劳动的生产力，突破了个体劳动生产力的局限，创造了一种新的更大的生产力。“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⑥。资本的这种财富使用价值生产方法的改良，虽然只是将原来的个体劳动结合为集体劳动，但是集体劳动所创造的生产力远远大于个体劳动生产力的简单加总，这从财富使用价值的生产规模和效率上突出表现出来。

资本的简单协作的生产方法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以往的生产方法本身，劳动者依旧需要按照时间顺序生产财富使用价值，或者说劳动者依然需要参与财富使用价值的全部生产过程。“但是外部情况很快促使人们按照另一种方式来利用集中在同一个场所的工人和他们同时进行的劳动”^⑦，在这里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8、36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4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8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1页。

所谓的“另一种方式”即是劳动分工。原来协作的劳动者在同一空间中按照时间顺序参与全部生产过程，而现在生产过程则被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分配给不同的劳动者，以协作为基础的分工逐渐显示出现代工场手工业的优势。在这里，资本的财富使用价值生产方法的改良，进一步凸显了资本促进生产力进步的文明性。劳动分工使劳动者专注于某一操作，“经常重复做同一种有限的动作，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有限的动作上，就能够从经验中学会消耗最少的力量达到预期的效果”^①，劳动分工导致的局部劳动越重复越能够减少财富使用价值生产时间的耗费。劳动分工越细化，劳动者的劳动工具就越完善，因为劳动过程的细化促成劳动工具的分化和专门化。劳动工具的分化和专门化在提升劳动效率的同时为机器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也就是说，为资本的生产方法进一步的革命性变化奠定了基础。

资本的生产方法最为彻底的文明性表现在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法上。协作、分工的生产方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生产过程对劳动者的依赖，而机器大工业却在生产方法上突破了这一依赖。发达的机器将劳动者的工具转移到机器机构上，摆脱了劳动者器官数量和肌肉动力对生产财富使用价值的限制，生产过程的连续性、规则性、一致性得到革命性提升。财富使用价值生产过程对劳动者的依赖转化为对机器的依赖。资本的应用机器的生产方法是科学本身进步的体现和科学在生产中应用的结果。机器的应用离不开对力学规律和化学规律的科学发现，科学越发展、机器越完善，生产过程对机器越依赖。“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②，这种“作用物”——机器——是科学进步的集中表现。依托科学进步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方法，随着科学进步使生产规模不断突破可能性边界。资本的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法并不是某一个别资本的生产方法，而是作为资本整体的普遍性的生产方法。“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③。在这里，资本的生产方法的文明性是以往生产方法不能比拟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④。

2. 资本生产方法的野蛮性

资本的协作、分工、机器大工业等生产方法促进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进步，然而在这种文明性背后是以劳动异化为代价的，资本生产方法的文明性和野蛮性并存。劳动异化是协作、分工、机器大工业等资本生产方法野蛮性的核心表现和概括，在这里，相对于这种资本生产方法本身的野蛮性，还存在着一种野蛮性，那就是这种生产方法利用劳动的社会结合和劳动资料的革命所创造的生产力，被资本野蛮占有。可见，劳动者劳动异化的代价并没有换取对生产力进步的占有，而是资本占有和利用这种生产力进步实现了价值增殖。资本能够野蛮占有生产方法本身所创造的生产力，原因在于劳动者“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⑤，也就是说，原因在于资本尽其所能地消灭了劳动者与劳动条件任何可能上的统一，从而形成劳动者和劳动条件实际上的对立。资本正是通过占有劳动者失去的劳动条件，从而占有了劳动过程所创造的一切，这自然包括协作、分工、机器大工业等生产方法所创造的生产力。

资本的协作、分工的生产方法导致劳动异化的突出表现是，劳动者的畸形化、片面化发展。资本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3-39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5-19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7页。

的协作的生产方法需要的不是劳动者的个体劳动能力，而是劳动者结合起来的整体劳动能力，个体劳动能力在这种生产方法中的作用越发渺小。在这种生产方法下，由于个别劳动者如果不与其他劳动者结合起来劳动，将不能独立从事生产劳动。劳动者失去了独立从事财富使用价值创造的地位，其个别劳动能力和作用被弱化。这种弱化加剧了劳动者在资本面前的卑微。资本的分工的生产方法需要的不是劳动者复杂的、全面的劳动技能，而是劳动者简单的、片面的劳动技能，劳动技能的简单化、片面化是这种生产方法提高劳动效率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在这种生产方法下，劳动者创造财富使用价值的劳动独立性完全丧失，劳动者参与的只是财富使用价值某一部分、某一环节的生产，从其单纯的自身的劳动过程来看，劳动者甚至不知道最终生产的财富使用价值是什么。在这种生产方法下，没有独立工人的概念，只有总体工人的概念，劳动者在资本面前卑微得更加彻底了。简单的、单一的、重复的劳动，使劳动变成了不依赖技能的机械的肌肉记忆。“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①。可见，资本的协作、分工的生产方法牺牲了劳动者的完整的劳动能力，发展的是劳动者异化得非常片面的专长。

资本的协作、分工的生产方法发展为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法，劳动的异化更加没有底线了，资本的生产方法的野蛮性也更加没有底线了。机器在生产中的使用离不开科学的发展，然而“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②。机器和科学的生产力都被资本野蛮占有和利用，它们所代表的生产力成为资本的生产力，它们都成为资本实现价值增殖的重要手段。在资本的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法下，机器作为生产过程中资本的物的形式，机器是财富使用价值生产的直接控制者，劳动从属于机器的运转，劳动者沦为机器的部件，成为机器的附庸。劳动技能在这种生产方法中已经无足轻重，这种生产方法追求的恰恰是劳动复杂程度的最大限度的简单化。这种生产方法消灭了劳动者之间的性别、年龄和技能的差异，这逼迫原来掌握一定技能的成熟的壮年男性劳动力降低劳动报酬，否则随时会被妇女和儿童所取代。在这里，抵抗的代价是被淘汰出生生产过程，劳动者在资本面前不仅彻底丧失了谈判能力，而且彻底丧失了尊严。在资本的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法下，只要提供足够的动力，机器可以持续运转，因而可以昼夜吮吸劳动；只要被允许，工作日可以延长到一切可能的界限。这种生产方法使劳动的复杂程度简单化，但却丝毫没有降低单位时间内的劳动耗费，而是增加了单位时间内的劳动强度。“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夺去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③可见，资本的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法相对于协作、分工的生产方法，其促进生产力进步的文明性是突出的，其导致劳动异化的野蛮性同样是突出的。

三、资本生产关系的双面性

1. 资本生产关系的文明性

资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基础上产生和存在的，“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④。可见，资本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产物。简单地说，生产关系是生产当事人的关系，由于广义的生产包括直接生产过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6-48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3页。

程、分配过程、交换过程、消费过程，所以生产当事人关系从上述四个方面表现。因此，资本生产关系的文明性也主要从这四个方面体现出来。资本生产的主要当事人包括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资本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雇佣工人是劳动力的所有者，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分开的、对立的。从人类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历史来看，生产过程是劳动和生产资料两种基本生产要素的结合过程。资本的生产只有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资本家雇佣到劳动力的所有者——工人，才能够得以进行。在这里，资本的生产关系表现为雇佣关系，其文明性在于它使劳动者摆脱了以往血缘、人身、政治、宗教等方面的限制，成为劳动力的自由出卖者。这种关系使财富使用价值的生产能够得到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从而促进财富使用价值生产的发展，这意味着这种关系不但适应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并且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在狭义上，单纯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财富使用价值的过程，但资本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财富价值的过程，或者确切说是直接生产资本的过程。在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质上是物的关系的人格化表现。在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作为资本存在，从财富价值的形成角度看，生产过程不是劳动使用作为资本的生产资料的过程，而是作为资本的生产资料使用劳动的过程，这种资本使用劳动的物的关系的人格化，表现为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文明性在于，只有在这种关系下，也就是说，生产资料以资本形式存在、劳动以雇佣劳动形式存在，生产过程才是一个以资本价值增值为目的的创造财富使用价值的过程，资本为实现价值增值的目的必然会促进财富使用价值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在这种资本使用劳动关系的人格化表现中，资本家和工人都作为生产者出现，工人的劳动是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资本家的劳动是监督指挥工人的劳动，这种监督指挥劳动使整体工人劳动得以协调和统一，这在客观上提高了财富使用价值的生产力水平。在这种关系下，还内含着工人彼此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无论竞争还是合作，在一定程度上都增进了财富使用价值的生产力水平。

资本的分配、交换、消费关系，都是直接生产过程关系的外延。分配是以财富价值为核心而表现为财富使用价值的分配。资本的分配分为两部分，“产品一方面分为资本，另一方面分为各种收入”^①。生产中耗费的财富使用价值——生产资料——的价值，在生产出的财富使用价值中作为资本——生产资料——收回，如果不考虑土地参与财富使用价值的创造，生产出的余下财富使用价值作为工资和利润分配下去。可见，这种分配又回到了最初资本家和工人的对立关系，资本家占有客观劳动条件——生产资料，工人不占有客观劳动条件——生产资料。这意味着再生产仍然是资本的再生产，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意义上说，资本的文明性又得以继续。作为利润分配的财富使用价值的价值是作为资本报酬被资本家占有的，大部分利润不是被消费掉而是转化为新资本进入再生产过程，从而使财富使用价值的生产规模扩大。这种扩大规模的财富使用价值的再生产，意味着社会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意味着资本的文明性进一步推进。

交换是资本直接生产领域增殖的财富价值的实现过程。资本的生产目的并不是所生产的财富使用价值本身，而是财富使用价值潜在的价值，这意味着交换是实现资本生产目的的必经过程。所生产的财富使用价值在资本眼中都是无用物，对资本来说，财富使用价值唯一有用之处在于——它包裹着决定资本命运的价值，但价值穿着财富使用价值的外衣又恰恰是资本性命攸关的时刻，只有价值从财富使用价值的外衣中挣脱出来，蜕变为价值的一般社会形式——货币，资本才最终到达了安全的彼岸，实现了最初的目的。而这一切都需要交换来完成，并且是一种普遍的交流才能完成。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94页。

“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为前提。”^① 资本的交换关系打破了以往孤立的、封闭的关系，建立了世界的普遍联系。资本的财富使用价值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促进了交换关系的不断扩大，交换关系的不断扩大又反过来促进财富使用价值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在这里，资本交换关系的文明性表现在促进财富使用价值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上。

消费是交换来的财富使用价值的具体使用过程，是财富使用价值的消耗和终结过程。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或者说生产决定了消费，但没有消费同样没有生产，也就是说消费又决定了生产。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意味着消费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生产的规模和水平。由于再生产本质上是资本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因此，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促进了资本生产关系文明性的进一步发展。消费分为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单纯的生活消费是纯粹的消费者的个人私事，并没有建立起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但生产消费却不一样。以往的生产消费过程是劳动者消费生产资料的过程，但资本的生产消费过程恰恰是一种颠倒。在这里，生产资料是作为资本存在的，因此，生产过程并不是劳动者消费生产资料的过程，而是资本消费劳动的过程，经历了这一过程资本因吸纳了劳动而增殖了。在这里，资本和劳动的消费关系背后所建立的生产当事人关系，正是前文已述的直接生产过程中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的文明性不言而喻、不再赘述。

2. 资本生产关系的野蛮性

资本生产关系的文明性不是绝对的，它的野蛮性与文明性相伴而生。资本生产关系的野蛮性从资本生产关系的形成要素及其表现形式凸显出来。资本的生产关系的形成以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或者说，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是形成资本生产关系的前提。资本的生产当事人关系本质上是物的关系的人格化，也就是说，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关系的人格化。资本生产关系的建立，并不是因为在财富使用价值的生产中，生产资料作为生产资料本身与劳动作为劳动本身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生产资料和劳动与以往的生产方式一样都作为生产的基本要素；而是因为生产资料和劳动所采取的社会形式发生了变化，进一步说，生产资料采取了资本的形式，劳动采取了雇佣劳动的形式。作为生产财富使用价值的客观劳动条件——生产资料，与劳动是分开的，是独立的，是作为资本家的个人财产被占有的。这种占有是作为资本占有的，即作为能增殖价值的价值占有的。由于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因此资本实现价值增殖的关键在于吸纳劳动。然而劳动不是商品，而劳动力才是商品。资本为吸纳劳动而增殖，资本的所有者——资本家——必须向劳动力的所有者——工人——购买劳动力，由此发生了两个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初步交换关系。在这里，这种关系的野蛮性在于实现这种关系的前提条件，工人必须和生产的客观劳动条件彻底分离，“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②，不能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必须自由得只剩下劳动力。在这样苛刻的野蛮的条件下，工人为了生存只能被迫出卖唯一的“财产”——劳动力，从而发生和资本家的初步交换关系。随着劳动被吮吸到资本中，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在生产过程中进一步深化，这种关系的野蛮性也更加彻底。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并不限于流通领域里的一次交换，而是在生产领域里发生了第二次交换。在流通领域里根据等价交换原则，资本家支付了工人劳动力的价值，就交换本身来说，这和一切其他商品的交换没有什么不同。资本家实际购买的是工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这种使用价值在使用时表现为劳动，而劳动又能够创造新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真正需要的不是劳动力本身，而是劳动力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2页。

发挥使用价值作用所表现的劳动；真正需要的不是劳动所创造的新的使用价值，而是劳动所创造的新的价值。因此，在生产领域中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发生了第二次交换。这次交换是野蛮的、不等价的。这是因为工人付出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大于资本家所支付的劳动力的价值，或者说，工人的劳动只有一部分是有酬的，剩余的劳动是无酬的。工人无酬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在这里，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渗透着野蛮的剥削。

随着财富生产过程的结束，资本家和工人关系的野蛮性在分配领域里进一步凸显。在这里，分配是资本主导的分配，这种分配使资本的统治地位加固和扩张。分配之前，生产过程所创造的新财富在所有权上归资本家，工人只能听命于资本家的“施舍”。从分配的内容上说，在同样不考虑土地参加财富使用价值生产的情况下，在假设新财富的价值顺利实现转化为货币的情况下，生产所形成的财富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两部分，具体地说，分为资本、工资、利润。在这里，通过这种分配，资本家首先保证了其原有的资本财产在价值上不能有任何损失，并且其资本财产在总量上增殖了。对资本家来说，资本追求的不是一次增殖，而是不断增殖。在资本财产不断增殖的贪欲的牵引下，资本家的个人消费是受增殖欲望限制的，利润只有一部分用于其个人消费，剩余部分并入资本从而壮大资本。在这种分配中，工资是资本家按照工人劳动力价值分配给工人的，这个价值的分配迫使工人仅维持能够生存状态，继续重复自由得一无所有不占有任何劳动条件的状态。从这种野蛮的分配关系开始的资本再生产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而生产规模的扩大必然伴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而生产力水平提高必然意味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必然表现出对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由此，随着资本规模的扩大，劳动在资本面前、劳动者在资本家面前愈加卑微，资本生产关系的野蛮性可见一斑。“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①

综全文所述，资本的双面性——文明性和野蛮性，表现在生产目的、生产方法、生产关系等三个方面。资本本身以及以资本为核心的生产方式是一个历史的、暂时的存在，这意味着资本的文明性和野蛮性也是历史的、暂时的，不是永恒的、绝对的。永不停息地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价值的增殖，这是资本作为一个整体的欲望和本性。但对个别资本来说，绝不满足于作为资本整体的一般的财富价值增殖程度，而超越一般的财富价值增殖程度的必要手段和途径是提高其个别生产力水平。简单地说，就是通过个别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降低个别资本所生产的财富使用价值的价值，而按照财富使用价值的一般的社会价值出售。个别资本超额的价值增殖是短暂的，因为这必然引起同样逐利本性的其他资本参与竞争，由此导致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全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直接后果是，资本在生产资料部分的支出相对扩大，在劳动力部分的支出相对缩小，这必然导致资本的一般财富价值增殖程度下降。资本抵御财富价值一般增殖程度下降的有效手段是，扩大生产规模，以资本财富价值投入量的增加弥补资本财富价值增殖程度的下降。然而，资本扩大生产规模意味着社会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如此反复，最终，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到资本不能用财富价值投入量的增加弥补财富价值增殖程度的下降，或者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到资本的生产已经不需要劳动了。资本是为财富价值增殖而生的，使用劳动是资本财富价值增殖的唯一途径，而此时失去了增殖源泉了，不能增殖了，这意味着资本灭亡了。资本灭亡了，资本的文明性和野蛮性也一同下葬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构建高水平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43-744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举措。而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科学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特性，“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①，又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上，必须科学认识和把握《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的双面性——资本的文明性和野蛮性并存，二者是同一过程两位一体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二者是相互不可替代的关系和相互不可选择的关系。这将有助于科学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特性，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进而有助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终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

[3] 习近平：《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求是》2022年第10期。

[4] 刘伟：《规范和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健康发展》，《经济学动态》2022年第8期。

（编辑：黄华德）

（上接第60页）史走向的鲜明旗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开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条道路和平共处的历史空间，匡正了现时代国际社会的前进方向，是世界普遍交往范式的当代重建，是世界历史目前阶段的共同纲领。一句话，唯有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在全球范围内真正解决人类命运问题，才能打开通往“真正的共同体”的正确道路。

参考文献：

[1] [美] 迈克尔·巴尔：《中国软实力》，石竹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

[2] 孙来斌：《超越“中心-外围”的世界体系分析模式——兼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意义》，《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第21期。

[3] 赵可金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与世界意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3期。

[4] 李包庚：《世界普遍交往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5] 刘同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

[6] 马援：《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理论及实践与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4期。

[7] 宋建丽：《全球治理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超越性内涵》，《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8] 谢惠媛：《海外学者视野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外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编辑：刘曙辉）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1、28、29、30页。